

从印尼社会特点看 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

范若兰*

【内容提要】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影响较小。这是由印尼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印尼是多元种族社会,主张融和的爪哇文化占主导地位,印尼穆斯林大都属名义穆斯林,加之威权政治下的弱政党制度,使得印尼人更拥护潘查希拉而不是伊斯兰教为立国基础。

【关键词】 印尼 多元社会 伊斯兰教 政治

一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两亿多人口中,约85%是穆斯林。印尼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既不同于中东国家,也不同于其近邻马来西亚,印尼属于伊斯兰教弱政治化国家。

伊斯兰教是政治性很强的宗教。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伊斯兰教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政治领域,但由于各国伊斯兰教势力的强弱、现代化的程度、社会文化及地区周边环境存在差异,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教政治化程度也有很大不同。

笔者认为,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强政治化,也可称为伊斯兰激进主义,以伊朗为代表。这类国家的伊斯兰势力夺取了国家政权,将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的主要依据,并强调以伊斯兰教原则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等

领域实行全面伊斯兰化。在这类国家中,不仅伊斯兰教政治化,政治也完全伊斯兰化了。

第二种是中政治化,也可称为伊斯兰温和主义,以埃及和马来西亚为代表。这类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实行政教分离政策,追求政治、经济及教育体制的世俗化。但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作用逐渐加强,具体表现是伊斯兰教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标志,不少政党为争取选民的支持都竞相打出伊斯兰教的旗号;政府将伊斯兰教作为政策合理性的辩护工具,并以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但对以推翻现政权、建立伊斯兰教国为目的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坚决镇压。可以说,在这类国家,有不同程度的伊斯兰教政治化,但政治还没有伊斯兰教化。

第三种是弱政治化,以土耳其和印尼为代表。在这类国家中,伊斯兰教不是国教,政府奉行世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制度,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较小,也不是立国的

*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

基础。可以说,在这类国家,伊斯兰教基本没有政治化,政治更没有伊斯兰化。

印尼独立以来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苏加诺时期(1945~1965年)、苏哈托时期(1965~1998年)和后苏哈托时期(1998年至今)。不论是苏加诺时期还是苏哈托时期,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一直受到压制。苏加诺取缔了伊斯兰政党马斯友美党^①,苏哈托则将所有伊斯兰教政党合并成一个政党,并弱化了其伊斯兰教特点,同时将所有伊斯兰教组织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后苏哈托时代历经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苏西洛四任总统,国家处于失序和混乱状态,沦为“弱国家”,其特点是政府行政能力下降;社会结构冲突严重、趋向涣散^②。后苏哈托时期,印尼各种势力争斗不休。其中既包括各政党、军队、警察、民众团体、极端组织,也包括伊斯兰势力和地方分离势力。伊斯兰教在倍受压抑后,其能量在新形势下重新释放,伊斯兰政党纷纷建立,并高举伊斯兰教大旗参与政治,显现出伊斯兰教从政治边缘向中心进发的势头。但从1999年和2004年的选举结果来看,伊斯兰教在印尼政治中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二

印尼伊斯兰教弱政治化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立国的基础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潘查希拉(Pancasila,亦称建国五基)。

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1950年8月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新生的共和国实行自由民主制,政教分离,以潘查希拉为国家指导思想,即民族主义(印尼的统一)、人道主义、协商和代表制下的民主、实现社会的正义与繁荣以及信仰神道。信仰神道被列为第一基,苏加诺提出宗教信仰应当

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宽容的基础上,“不只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要信仰一个神,而且,每个印尼人应该信仰各自的神。基督教徒应依照耶稣的指示信奉其上帝,伊斯兰教徒应依照穆罕默德的指示信奉其真主,佛教徒应依照他们自己的经典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但是,让我们大家都信仰神。”^③于是,在印尼,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印度教地位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印尼85%的人口信仰的伊斯兰教并没有被定为国教。潘查希拉原则一直为后来的历任总统和大部分民众所遵循。

二是伊斯兰教不是政治合法性的标志。

苏加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是他不断掀起的革命运动,苏哈托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在印尼,伊斯兰教很少像在马来西亚或中东国家那样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尽管印尼有少数激进组织以伊斯兰教为号召进行反政府宣传,但政府和合法政党很少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在印尼,伊斯兰教仅被用来对某些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如计划生育。另外,伊斯兰教还部分地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如印尼政府不仅镇压伊斯兰极端组织,还严密控制乌来玛和伊斯兰教组织,并通过其控制穆斯林。

三是伊斯兰教政党在政治中难以发挥较大作用。

在印尼政治舞台上,始终是主张潘查希拉和民族主义的政党唱主角,如苏加诺时期是民族党,而曾发挥较大政治作用的伊斯兰

^① 马斯友美党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政党,1952年该党党章规定其宗旨是“在个人生活、社会和印尼共和国实现伊斯兰原则和法律”。B. J. Boland, "The Struggle of Islam in Modern Indonesia (1950-1955)", in Ahmad Ibrahim, Sharon Siddique and Yasmin Hussain, eds., *Readings on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85, p. 138.

^② 庄礼伟:《“弱国家”形态及其根源:印尼的案例》,载《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2期,第27页。

^③ 转引自(澳大利亚)J·D·莱格:《苏加诺政治传记》,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3页。

教政党马斯友美党则于1960年被取缔。在苏加诺统治后期伊斯兰政党在政治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苏哈托时期是专业集团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为了牢固控制权力,1973年苏哈托要求所有以伊斯兰教为号召的政党联合组成建设团结党。该党包括几个穆斯林政党组织,即伊斯兰教师联合会(NU)、穆斯林党(MI)和伊斯兰协会(SI)等。尽管建设团结党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没有公认的领袖,又由于党派纷争而软弱不堪,但它毕竟贴有伊斯兰教的标签,因而获得了一些穆斯林的支持。在1977年、1982年大选中建设团结党分别获得29.3%和28%的选票。在亚齐和雅加达,建设团结党的得票率甚至超过专业集团^①。面对这一情况,苏哈托决定对建设团结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1982年8月16日苏哈托在一次讲演中要求所有政党和宗教组织都应以潘查希拉为指导思想。1984年国会通过决议,正式要求所有政党和组织接受潘查希拉,放弃自己原有的宗旨。建设团结党不得不下伊斯兰教的旗帜,把潘查希拉作为党的惟一指导原则,党徽也从麦加圣殿变为没有宗教色彩的五角星,从而抹去了它的最后一点伊斯兰教痕迹。

后苏哈托时代,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增大,主要表现是以伊斯兰教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纷纷建立并在选举中取得较好成绩。1999年大选中,共有30个以潘查希拉为指导思想和15个以伊斯兰教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包括建设团结党、星月党、正义党等)参加选举。结果伊斯兰教政党共获得17.8%的选票^②。2004年议会大选中,共有24个政党获准参加选举,其中5个是伊斯兰政党,结果专业集团得票第一,民主党第二,伊斯兰政党(主要是建设团结党和正义福利党)获得约15%的选票^③。

三

为何伊斯兰教在印尼这个穆斯林大国的政治中的作用如此之小?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宗教政治化程度与诸多因素有关,其中包括种族分布、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架构、国际环境等,印尼伊斯兰教政治化程度也与上述因素息息相关。笔者主要从印尼的穆斯林特点、种族构成、政治文化和政治架构等多个层面来分析其伊斯兰教弱政治化的原因。

(一) 虔诚穆斯林与名义穆斯林

印尼穆斯林的构成是多元的。印尼信仰伊斯兰教的部族主要有:(1)爪哇族,占印尼人口的47%,分布在东爪哇和中爪哇;(2)巽他族,占人口14%,分布在西爪哇;(3)马都拉族,占人口7%,分布在马都拉岛和东爪哇;(4)米南加保族,占人口3.4%,分布在苏门答腊;(5)马来族,占人口1.6%,分布在苏门答腊等沿海地带;(6)亚齐族,占人口1.4%,分布在苏门答腊北部。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上述部族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上有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巽他族、马来族和亚齐族对伊斯兰教信仰较为严格,能严格遵守教规和教义,而爪哇族、米南加保族和马都拉族深受印度教、佛教、万物有灵论和母系氏族传统影响,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知之甚少,不严格遵守教规和教义。通常能严格遵守教规和教义的穆斯林被称为虔诚穆斯林——“圣特里”(Santri);而

^① 1977年大选中,建设团结党在雅加达和亚齐分别得到43.5%和57.3%的选票,而专业集团在上述两地的得票率分别为39.4%和41.2%。Leo Suryadinata, *Military Ascendancy and Political Cultur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hio University, Ohio, 1989, p. 77.

^② Leo Suryadinata, *Elections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2, p. 106.

^③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5月7日。

能严格遵守教规和教义的穆斯林则被称为名义穆斯林——“阿班甘”(Abangan)。前者约占印尼穆斯林人口的30%，主要分布在爪哇西部和苏门答腊等地，后者占70%，主要分布在爪哇中部和东部。

但是不少学者指出，80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印尼人对伊斯兰教认同加深，不少阿班甘的后代成为圣特里，圣特里的人数和比例都在增加^①。尽管如此，印尼大部分穆斯林仍属名义穆斯林。印尼共和国的六任总统，除瓦希德外，都属于“阿班甘”。瓦希德总统也有很多行为并不符合严格的伊斯兰教义，如他相信超自然力量，宣称经常要去圣墓，接受与圣徒的心灵对话等。正是因为不论是领导人还是一般民众，都是阿班甘占主导地位，所以印尼社会伊斯兰化程度远远比不上中东国家和马来西亚。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印尼穆斯林乐于接受潘查希拉，为什么印尼的伊斯兰学者极力倡导的是印尼社会的伊斯兰化而不是建立伊斯兰教国，为什么伊斯兰政党并不能得到大部分穆斯林的支持。

(二) 主张和谐、融合的政治文化

印尼的文化传统以爪哇文化为主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印尼的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限制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性。“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一政治文化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所形成。”^②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所构成的文化因素会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居住在爪哇的印尼人占印尼总人口的65%，爪哇族占印尼人口的47%。爪哇文化构成了印尼主导文化，其来源是当地的神秘主义、万物有灵论、印度教、佛教、各种神话传说以及伊斯兰教，这些来源互相融合，以皮影戏和宗教仪式反映出来，深深影响

了爪哇人的伦理道德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中产生的一些观念，如和谐的大一统观、融合与容忍等观念都影响到印尼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

和谐的大一统观念是爪哇人世界观的基本要素之一，强调兼容并蓄、包罗万象，进而形成一个和谐统一体。中国学者张锡镇指出，“根据爪哇人的观念，世界万物被看作组合起来的单一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所谓的神。所有一切都来自于神，回归于神。神主宰一切，又包容一切。这种超自然力的神为世界万物规定了各自适当的相互依赖和共存的关系，于是一切都和谐地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之中。”^③新加坡前驻印尼大使李炯才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爪哇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异中求同，相依共生^④。

融合与容忍观念也是爪哇文化的重要特点，强调文化的融合和宽容。爪哇文化本身就是由多种源流融合而成，“爪哇有宽容和调和各种不同信仰和宗教的传统。农村社会中的精灵主义和通神思想，以及印度教思想与神秘主义，王室宫廷的爪哇贵族关于天道与世道并行论的观点，伊斯兰教的思想，都在共处并存。”^⑤有一事例可以突出表现爪哇文化的融合性。据李炯才先生说，他在婆罗浮屠遇到一位导游苏哈索诺，此人自称既是佛教徒又是穆斯林，“我信奉先知穆罕默德和安拉。但我却遵循佛教徒的生活。我看不出这两者有

① Niels Mulder, ed., *Inside Indonesian Society: An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hange in Java*, Editions Duang Kamol, Bangkok, 1994, pp. 184-187.

② 加·阿尔蒙德、杰·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③ 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401页。

④ 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⑤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什么理由会有冲突的地方。^①这种集多种信仰于一身的人在爪哇为数不少,而苏加诺就是其中的一个,其思想来源既有爪哇神秘主义、印度教、伊斯兰教,也有西方民主思想,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苏加诺是怎样一个人呢?一个民族主义者吗?一个伊斯兰教徒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读者们,苏加诺是所有这些主义的混合体。”^②

和谐、异中求同、相依共生、融合和宽容是爪哇文化的不同方面,它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在爪哇文化中,宗教信仰、政治观点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和谐地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那就要异中求同、互相宽容、彼此协商,最终达到融合。正因如此,才会有苏加诺早年将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旧三元论,晚年将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揉和在一起的新三元论——纳沙贡(NASAKOM),才会有苏加诺提出的建国五基潘查希拉,才会有以后历任总统都将潘查希拉作为建国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印尼民众才会接受潘查希拉,将对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等同的安排安之若素。

潘查希拉可以说是印尼政治文化的最高境界,用苏加诺的话说,“如果我把五个原则合成三个,又把三个合成一个,那么我就能够用纯粹的印度尼西亚语说出来,那就是:互助合作。我们将要建立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必须是互助合作的国家。那将是多么美好啊!一个互助合作的国家。”^③苏哈托则更强调潘查希拉的“协调”、“平衡”和“团结”,“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协调稳定和前进,如何协调对安全的需要和高速发展运动的需要……我们务必协调理想和现实。”^④为了协调和平衡,他要求各政党和团体只能以潘查希拉为指导思想,并引入协商的方法,“潘查希拉要求我们通过协商取得一致。只要存在分歧就应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⑤在和谐、异中求同、相依

共生、融合和宽容的理念下,苏加诺将所有东西都放在潘查希拉这个筐里,而苏哈托则加上协商一致,将筐里的东西搅拌融合,以此来消除不同意见,达到表面上的和谐。

(三) 多元种族与分散的地理

印尼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有300多个部族,居住在众多岛屿上,使用50多种语言,有各自的文化特点。其中,爪哇文化、马来文化、巽他文化和巴厘文化最发达。这些种族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万物有灵、神秘主义等等,尽管后来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但其他宗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并对各种族和地域产生不同影响。中爪哇和东爪哇是名义穆斯林地区,亚齐、西爪哇、南苏拉威西是虔诚穆斯林地区,巴厘岛则是印度教地区。

在前殖民地和殖民地时代,印尼各地区和各种族并不是政治统一体,在民族独立斗争中,才逐渐形成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概念。为了使其他种族加入独立后的印尼,在独立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爪哇人尤其是苏加诺发扬融合、和谐和宽容的爪哇精神,不强调伊斯兰教的突出地位,而提出潘查希拉,力图包容主要文化和宗教,达成各种族的团结。1945年,伊斯兰教师联合会领导人瓦希德·哈斯伊姆也指出,对穆斯林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教在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而是“我们用什么方式确保所有宗教在自由的印度尼西亚的地位?我们最需要的是国家的稳定和团

① 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第174页。

② 转引自 澳大利亚 J·D·莱格:《苏加诺政治传记》,第139~140页。

③ 同上书,第184页。

④ Eka Darmaputera, *Pancasila and the Search for Indent and Modernity in Indonesian Society: A Cultural and Ethical Analysis*, E. J. Brill, Leiden, Netherlands, 1988, p. 182.

⑤ 苏哈托:《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结。^①政治精英们希望用弱化伊斯兰教的方式来团结各种族,维持国家的统一。正如1953年苏加诺在加里曼丹的一次讲话所言,穆斯林关于建立伊斯兰教国的要求将分裂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全体印尼人的国家,如果建立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国家,许多不是伊斯兰教的地区,如巴厘、弗洛勒斯岛、卡伊群岛和苏拉威西将退出。西伊里安也不再成为印尼国土的一部分,也不想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②

但宗教势力和地方势力天然有与中央政权对峙的倾向。伊斯兰教和地方分离主义结合在一起,在苏加诺统治时期就发起多次叛乱。亚齐分离主义运动从苏哈托时期开始就一直是印尼最难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印尼的社会矛盾主要不是表现在不同宗教之间,而是表现在不同种族和地域的穆斯林之间,严格来说是以爪哇为代表的阿班甘和以苏门答腊为代表的外岛圣特里之间的对抗。印尼要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首先是要树立潘查希拉,强调只有和谐、宽容、平衡、融合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统一,突出任一方面都会导致社会的分裂,所以印尼政府从不强调伊斯兰教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是保证权力高度集中,这直接导致了苏哈托的威权统治。

(四) 威权主义的政治架构

印尼一直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苏加诺统治初期,总统没有实权,政党权力较大;后期是“有领导的民主”,总统权力增大,政党权力较小。苏哈托时期总统和军队权力极大,政党几乎已成陪衬。后苏哈托时期政党势力重新崛起,而军队权力减小。

尽管独立以来印尼政治舞台上总统、政党、军队的权力互有消长,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总统和军队唱主角,政党表现软弱,这对伊斯兰教的弱政治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历任印尼总统都是潘查希拉的坚决维护者,即使是圣

特里出身的瓦希德总统也一向支持潘查希拉原则,并认为印尼的民族团结应基于潘查希拉而不是伊斯兰教。早在苏哈托时代,他就说过:“潘查希拉是一系列原则,它将永存,它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国家信念,我将用生命保卫潘查希拉……”^③任总统后,他也一再重申潘查希拉原则。大部分总统,尤其是苏加诺和苏哈托认为伊斯兰教是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一直压制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军队更是潘查希拉的保卫者,视伊斯兰教为不安定因素,对伊斯兰极端组织坚决镇压,对一般伊斯兰组织的活动则严密监控。

一般来说,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它能有效地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充当社会势力与政府联系的纽带。政党竞争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为获得选民支持,政党通常使用最富有号召力、最为选民关心的议题。在很多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是最有号召力的旗帜之一,因而政党竞相利用伊斯兰教做宣传。但印尼的弱政党制使其几乎不能利用伊斯兰教,苏哈托为加强政治控制,简化政党,导致伊斯兰教政党丧失了伊斯兰色彩,使得伊斯兰教不能用于宣传和动员的目的,削弱了其政治性。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局大变,印尼政党不再是弱政党,纷纷建立的伊斯兰教政党打着伊斯兰旗号以吸引选民。在政党竞争中,伊斯兰教的宣传和动员作用有所上升,但从选举结果和政治运作来看,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作用依然有限。

^① Harry J. Benda, *The Crescent and the Rising Sun: Indonesian Islam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 van Hoeve, The Hague, 1958, p. 189.

^② Herbert Feith, *The Decline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 Y., 1962, p. 281.

^③ 转引自Douglas E. Ramage, *Politics in Indonesia: Democracy, Islam and the Ideology of Tolerance*, Routledge, London, 1995, p. 45.